

苦旅文丛

陪都文化论

◎郝明工/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陪都文化论

谨将此书献给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郝明工/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新) 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天 山

封面设计：瘦 鬼

内文设计：文 汇

陪都文化论

郝明工/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乌鲁木齐胜利路 14 号 邮编 830046)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白马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1/32 9 印张 25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5631—0548—4/1·117 定价：13.80 元

简论陪都文化

(代序)

1 陪都,既表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这一政治地位的确立,更成为重庆的经济实力与意识作用随之发生巨大转折的标志。

从区域性文化中心向全国性文化中心过渡,陪都文化,就是这一转变的产物,它作为中国抗战时期战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需要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即从“大文化”的器物、制度、心理的各个层面上来进行阐释。这样就能避免仅从所谓精神文明的角度予以考察的偏颇,将文化发展的不同时代与态势结合起来,以达到一种较具客观性的认识。同时,将陪都文化置于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来描述,就可以看到它在中国内陆城市的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代表性意义:从抗战爆发前的滞后于沿海沿江中心城市,到抗战中逐渐转向全国领先的地位,而抗战胜利后又如何失去这一地位。由此而引发关于文化发展的思考:文化滞后走向文化领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陪都文化这一文化现象是极其庞杂的,要把握其全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不得不在简化的基础上进行阐释的尝试。首先,将重庆文化发展与城市现代化联系起来,着重考察陪都重庆在城市经济、政治、意识这三个层面上的交互作用与系统功能的整合水平。其次,选取大众传播和文艺活动两个视点进行过程描述,以完成关于文化交流与自由创造水准的综合分析,进而揭示陪都重庆在走向现代城市的文化变迁风貌。

陪都文化具有三重特殊性,那就是它与抗日战争的关系,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与爱国民主思潮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战局相适应的两个时期: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到反对法西斯专制的文化运动导向。因此,有必要通过动态的描述,来阐明陪都文化发展两个时期之间的有机联系及不同时期内的文化运动特征,文化运动中大众传媒与文艺创造的多重关系及其对陪都文化的直接影响和推动。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重庆已经成长为长江上游地区
2 的文化中心,其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具有滞后性,整体上落后于沿海沿江中心城市;其文化发展的个体特征则表现为在经济、政治、意识诸层面上,功能转换强度以特定社会阶层的实际利益为限度,功能效率增长则以该利益集团的现实需要为准绳。因此,出现了以报业为主的大众传播,新闻事业的相对繁荣主要是满足商品贸易与地方自治的需要,而出版事业则因成本高收益低与人口中文盲众多而难以发展。与此同时,雅文艺、俗文艺、市民文艺分别在文艺观念、艺术形态、艺术传播模式等方面表现出由旧趋新的走向。

抗战爆发后,随着战略与政略的调整,文化中心的转移,陪都文化为适应抗战而形成特别的发展机制;通过战时体制进行指令性控制。这样,陪都文化发展趋于领先就体现出战时性这一总体特征。然而,战时体制虽然有助于功能转换的强化,但同时又导致功能的失范,使文化运动难以为继。战时性的实质就是暂时性,抗战胜利之后重庆的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即可证实。抗战带来了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历史契机,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精神复兴的要求。在陪都,群众性的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公开性和宣传性逐渐与合法性与专业性趋于一致,也就形成了陪都文化发展的个体特征。随着抗战从民族主义朝着国际主义的方向发展,陪都文化发展及其运动就表现出如下的根本性特点:在第一时期以爱国主义来推进民主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个时期以民主主义促进爱国主义,粉碎法西斯主义,从而

形成全民总动员,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

- 抗战爆发前,重庆的爱国民主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一定的自发性。随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陪都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公开地合法地迅速发展起来。重庆的陪都地位的明定,不但促进了重庆向全国文化中心过渡的完成,而且提高了知名度,从内陆城市向着国际大都市的方向迈进。在战略与政略相一致的前提下,坚持持久抗战,这就需要“国民精神总动员”以确保民族独立与自由这一奋斗目标的实现。

抗战中,随着国民政府迁渝,新闻事业打破了封闭的格局,逐渐走向引导全国舆论的中心地位,同时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成为向全世界,特别是以各种形式支持中国抗战的国家进行新闻宣传的中心。陪都新闻界以团结抗日为其主要政治倾向,《重庆各报联合版》的刊行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陪都新闻界通过报纸、电影、图片,甚至广播,使大众传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缩短了与世界的差距。陪都的出版事业也从几乎是零的基点上起步,并且与抗战紧密相联系以服务于抗战,从而成为重要的出版中心。对新闻出版的战时审查,虽然难免严密防范,但仍有张有弛,有利于为争取自由权利而不断努力。

在全民抗战的洪流中,陪都文艺界除参与民众动员的种种活动,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号召,更是以辛勤的创作与艰苦的宣传,直接去推动民众动员向前发展,致使文艺活动不但成为民众动员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民众动员中发挥着引导作用,从而形成颇具影响力的文艺运动。陪都文艺界以文艺服务于抗战为神圣使命,认定文艺与抗战有关,注重文艺的表现范围与传播效果,以促进文艺在抗战中的自身发展,一切文艺论争都围绕着文艺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抗战而展开,从而达到共识,指导抗战文艺运动的正常进行。随着全国性文艺团体在陪都的存在,以及众多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艺工作者的到来,陪都日益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体现出中国文艺发展的新方向来。陪都的话剧、电影、美术、音乐运动所产生的社

会反响,有的较之文学运动甚至更为深远。抗战文艺表现出纪实性与正面性的审美特征,正是文艺服务于抗战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即所谓文艺创作的“报告文学化”。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但纪实性与正面性相交融的基点正是“这一个”,抗战文艺同时也是关于“人”的文艺。

太平洋战争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而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建立平等国家关系的新约更促使国人对自由平等的进一步思考,要求各界人士广泛参与陪都的民主运动。这一运动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这对于陪都“文化界总动员”来说,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经济上予以保障,从政治上作出承诺,从意识上进行重建,从而争取自由创造的权利。因此,重提科学与民主的“五四”课题也就是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作用,以满足广大农村、军队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达到鼓舞斗志,坚持抗战到底的目标。但同时也出现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恶劣倾向,造成了文化发展上的短视行为,不利于陪都文化运动的正常进行。

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对于陪都新闻事业进行单向性舆论控制的状况有所改变,开始体现出大众性与社会性的一致来。同时,陪都的大众传播手段除国外刚刚投入试播阶段的电视之外,已经与国际大众传播水平完全接近,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效率。尤其是陪都报业发展状况更表明随着抗战前途的日趋明朗,来自战时环境的制约,已经从以战略需要为主转入以政略需要为主,这与陪都文化运动的大趋势是相吻合的。在香港、上海等地的出版工作者陆续来到陪都后,在编辑工作社会化、印刷技术现代化,发行方式商业化三方面有力地促进了陪都出版事业的全新发展,确立了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但出版事业的过度商品化,造成了文化意识的混乱与衰退。所幸的是,以市场的评价掩盖文化的评价的出版怪现象,随即遭到陪都文化界的反击,开始由个人创办出版社,出版文化品位较高的各类丛书来促进文化创造水准的提高。废除新闻出版审查的事实更是显示出争取言论自由的来之不易。

在民主运动兴起之中,陪都文艺界努力争取保障生存与创作自

由的权利。抗战文艺不仅是抗战现实的形象反映,也是个人体验的独特表现,抗战文艺运动将由此而走上民主之路。因此,也就更加强调文艺的自由发展,造成了一种浓郁的审美文化氛围。所以,并非是文艺的贫困,而是个体自觉的缺陷与文化素质的偏颇,当务之急就是以认识抗战文艺运动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之间的关系为前提,承担起重塑国人文化人格的时代使命。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正视抗战文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文艺工作者与战时文化的关系。因此,要建设起具有民族高度的新文艺,就必然是文艺工作者提高自身的人格力量,深入现实生活,进行立足于真实的自由创造。于是,通过抗战文艺创作的心灵化,进行文化意识的剖析与再造,使抗战文艺成为中华民族新旧嬗变的心灵史,抗战文艺运动成为中华民族意识更新的心灵探索。由于纪实性与正面性的审美特征对抗战文艺的发展具有自我约束性,这就意味着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以更深刻更鲜明地揭示新形势下全民族的情绪与精神,而不是停留在某一层面上,进而从整体上显现出民族的灵魂。自然,纪实性生成为史诗性,正面性生成为重构性,在描写民族文化心态的现实中来重建民族文化人格的理想,来促成古树开新花的艺术创造的普遍产生。“雾季公演”作为陪都的中坚文艺活动,正是在对祖国母亲呼唤的回应中,进行文化的启蒙,以其最优化的社会传播效果,推动着人的自觉,人的创造,从而达到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

陪都文化的发展表明工业化对民族文化转型的必要性,民主化对民族文化转型的决定性,个人自觉对民族文化转型的必然性。文化发展滞后的现象,既存在于民族国家内的不同区域之中,也存在于世界各国之间,因此,通过政治层面上的运动来调适经济和意识层面上的运动,实际上已成为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滞后的一种替代性补偿。但是,过度的政治化造成了陪都文化在抗战胜利后的衰退,而适度的政治化则将直接促动民族文化的整体转型,可以说陪都文化运动已经体现出了这一点。

目 录

简论陪都文化(代序)

导言 重庆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 战前文化概况

- 1、区域性文化中心的生成
- 2、报业为主的大众传播
- 3、由旧趋新的文艺活动

二 陪都文化概说

- 1、全国性文化中心的形成
- 2、创造民族的新文化
- 3、文化运动的两个时期

上编 陪都文化运动的第一时期

(1937年7月7日——1941年12月9日)

一 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

- 1、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
- 2、国民精神总动员

二 大众传播走进现代

- 1、报纸新闻趋于繁荣
- 2、书刊出版走向兴旺

三、文艺大潮逐渐兴起

- 1、一切为着抗战救国
- 2、与抗战有关的文艺
- 3、全民总动员
- 4、胜利进行曲

下编 陪都文化运动的第二时期

(1941年12月9日—1945年9月3日)

一 肩负民主主义的使命

- 1、向人类文明之公敌宣战
- 2、文化界总动员

二 大众传播形成体系

- 1、新闻事业总体性进步
- 2、出版事业多向度发展

三 文艺运动蓬勃开展

- 1、为自由生活而创造
- 2、并非是文艺的贫困
- 3、古树的花朵
- 4、祖国在呼唤

余论 陪都重庆与文化发展

附录：主要参考资料

后 记

导言 重庆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 战前文化概况

1、区域性文化中心的生成

外来非正义战争作为经济侵略与政治侵略的前导,在以暴力手段克服了主权国家的军事抵抗之后,所采取的殖民地化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对不平等条约来从经济与政治上进行控制,在和平的伪装下静悄悄地改变被征服民族的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

19世纪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各国用武力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推动下,开始滑向殖民地国家的深渊。但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帝国,以其稳固的自然经济秩序,统一的政治行政体系,高涨的民族主义意识,顽强地抗拒着殖民地化的推进,促使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于是,帝国崩溃,自然经济秩序开始解体,政治行政体系走向重建,民族主义意识趋于自觉。这样,中国就进入了它的历史发展的近代阶段,与全人类文化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接轨,开始了由旧而新的文化转型。

然而,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固有的民族文化某一层面上的变动,而是需要变迁中的民族文化的整体性转换。这是因为“文化的

物质层,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变动不居,交流方便;而理论、制度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它规定着文化整体的性质;心理的层面,则最为保守,它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① 因此,所谓新与旧,无非是对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作出的一种相对规定,并非是绝对的对立。

所以,由旧而新的文化转型,在中国展现为由洋务运动经变法运动到新文化运动这样的渐次深化的历史过程,从而体现出从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发展在物质、理论、制度、心理三个层面上的民族性特征,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活力、性质、类型的可能限度与现实走向——所谓的富国强兵、立宪政治、伦理觉悟,促使中国由旧而新的文化转型简化为以经济、政治、意识为主的三个文化层面上的现实运动。其中,政治运动成为主导性的文化运动,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无论是国内战争还是国际战争,都支配着与之同时的经济运动与意识运动,中国文化发展因此而呈现出政治化的倾向。

民族文化变迁的引发动因与转型范式各不相同:“可以表现为文化发展的自主进化,可以是文化交流中的参照更新,也可以成为文化类型的直接转换”,^② 因而在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发展的道路是多元的,也就是每一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都有其独特的运动轨迹。但是,民族文化的发展最终将指向“现代”,人类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将民族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统一起来,每一民族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将成为全人类文化中富有活力的,独具魅力的,多样化的有机构成。

所以,如果不从包括物质、理论、制度、心理三个层面的大文化观的角度来对民族文化发展,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区域性的,进行整体考察,就往往会停留于繁富的文化表象之上,而无法把握民族文化的特质,去进行历史的描述,揭示民族文化的实际样态与运动流程。

① 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 年第 4 期。

② 郝明工:《试论瞿秋白的文化追求》《甘肃社会科学》1992 年第 4 期。

中国文化由旧而新的转型过程,集中体现为城市的现代化。首先,作为全国文化发展的标志,城市因其在经济、政治、意识三个层面上的交互作用,形成民族国家文化运动的总体网络;其次,作为区域文化发展的核心,城市因其在经济、政治、意识三个层面上的系统功能,成为整个区域文化活动的中心;其三,作为区域文化中心的城市,能否占据民族国家文化网络中的核心城市位置,往往取决于该城市在经济、政治、意识三个层面上交互作用和系统功能的整合水平。可见,通过对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考察,就有可能发现其运动形态及运动机制,达到关于中国文化转型的某种具有规律性的认识。

城市现代化在中国呈现为波浪冲击式的运动形态。在列强的武力威胁下,国门的开放从海岸向内地波及,其途径是沿长江而上溯。这表现为从沿海到沿江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为倾销洋货的通商口岸,并且出现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重庆正是在 1876 年中英签订的《烟台条约》中被确定为对外通商口岸的,1891 年重庆海关的开关,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1902 年,日本倚仗中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夺取了在重庆的王家沱建立租界的特权。这样,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第一个渗入列强势力的城市,重庆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武汉的洋货倾销中心。^①

城市现代化在中国表现出发展不平衡的运动机制。由于社会组织结构和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出现了区域的超前或滞后,并且在同一区域内也会出现中心城市的转移。因此,城市现代化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按照经济交往形式来决定城市发展的方式和走向。重庆开埠以来经济实力的增长,一方面是国外商品进口的增加,随之沿海沿江城市商品进口的激增,最后国内进口以压倒优势超过了国外进口;另一方面,重庆的商品出口也从无到

^① 《重庆大事记》第 22—23 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1989 年版。

有地呈直线上升,在进出口总额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①

重庆的经济地位是在国内与国外,特别是在区域内与区域外之间的商品贸易中迅速提高的。依靠国内市场甚于国外市场,不仅使重庆在全国城市网络中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更为要紧的是,这将直接影响到重庆在政治上坚持地方自治的独立性和意识上爱国反帝的全社会性。从1929年3月到1931年10月的两年多里,在重庆各界民众的不断要求和坚决支持下,重庆市政府派军警接管了王家沱日本租界。^②

必须指出的是,重庆作为四川最大的商品进出口集散地,其日益增长的城市经济地位主要是区域间商品交流活动的产物。与此同时,重庆的政治地位也逐年提高,从“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到“护法战争”,重庆实际上已成为统领全川的战略要地。^③ 1919年四川防区制的确立,更促使重庆变成地方军事势力必争之地。这一状态一直延续到1935年川政统一,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④

这样,到本世纪20年代,重庆主要凭借其在四川经济,政治领域内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成为长江上游地区唯一的中心大城市。^⑤

尽管直到1929年2月15日,重庆才根据在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市组织法》正式建市,组成了以重庆市政府为首的行政管理体系。但在建市以前,于1926年就出现了近代形态的市政管理机构:重

① 《重庆大事记》第23—54页;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第118—11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重庆大事记》第113—126页。

③ 《重庆大事记》第48—67页。

④ 《重庆大事记》第68、141页。

⑤ [美]G·W·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160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庆商埠督办公署。这是因为“重庆踞长江上游，为四川交通实业之中心，华洋杂处，商务繁盛，诚吾国西隅一大市场也。然而市政腐败，街道之狭隘，沟渠之秽污，煤烟之蒸蔽，其不堪居住，亦为全世界通商各埠所无，加以地狭人稠，肩摩踵接，非推行市政，力谋改造，实不足以策交通实业之发展”。^①从城市建设来看，重庆的市容与其商业重镇的城市地位却不相称的。但是，重庆作为四川省的政治中心的地位而是无可取代的。自辛亥革命后，确立蜀军政府为四川政治中枢的口号的提出开始，^②革命运动在重庆此伏彼起，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和中国共青团四川省委都先后在重庆成立，各派政治力量在四川都以重庆为焦点进行较量。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庆建立，从而确认了重庆的政治中心地位。同年3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重庆表示，在统一川政的前提下，“四川应作民族复兴之根据地”。^③这不仅表明了长江上游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即将成为战略大后方的现实可行性，而且也显示出重庆在战时体制中由区域文化中心向着全国文化中心发展的潜在可能性。

但是，以商品流通为主的重庆城市经济活动，固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扩大重庆的政治影响。最终却因经济发展的偏颇使政治活动局限于区域之内，以致成为地方军事势力长期争夺的一块肥肉，反而为向现代城市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与沿海沿江的中心城市拉开了差距。这正是内陆商业城市的重庆只能生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文化中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重庆文化在经济与政治层面上与中国文化转型的总体水平之间的差距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在意识层面上，重庆文化的意识自觉运动的轨迹虽然同样是从封建主义向民主主义过渡，但却落

① 唐式遵：《重庆市政计划大纲》《重庆商埠汇刊》1926年度。

② 张培爵：《蜀军政府始末》《辛亥革命纪事》，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第1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伍于时代。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思想大解放,是借助“五四”爱国运动为中介才在重庆引起初始反响的,对于科学与民主的追求根植于高昂的爱国激情之中,在显示巨大的感召力的同时却失落了冷静的理性思考,反而延缓了对思想大解放本身的真正把握。

1919年5月20日,重庆各中等学校代表开会筹备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6月28日改名为川东学生联合会),其行动纲领即为:“一、对内振兴学术言论,发展组织经济之接济,持永久不变之态度。二、对外演说,印刷小说和报章通讯,拍电联络京津各团体为一致之进行。”^①显然,这一纲领将思想解放与爱国运动杂糅在一起,以至于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认识含混,既要将言论自由与经济支持年扯一团,也要把小说与报章通讯混为一谈。直到1921年6月,川东学生联合会才公布了五条行动措施——“实行乡村讲演”,“推广平民教育”,“提倡实业”,“改组风俗”,“传播文化”。^②至此,在重庆开始了有意识地触及现代文化构成内涵,有目的地着手与之有关的民众活动,虽然仍未能摆脱理论思考的幼稚与笼统,实际行动的盲目与空洞。

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仍然使重庆人“如象服了兴奋剂一般,一变以前沉默态度,而为一种热烈奋发的样子”。^③于是出现了不少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开始普遍使用白话文,也进行新文学的创作尝试。

同时,由于商品流通的发达,形成了以商业资本家为主体的富商阶层而居于国民之首。尽管较之沿海地区,他们的经济实力要弱小得多,但仍不乏与“欧美争一点雄心”的意愿,开始认识到“中外交通”的必然性,“创新世局”的可能性,“各得利权”的必要性,“唤醒同胞”的现实性,并将上述认识刻成楹联悬挂于重庆总会界内外。这样,1904

① 《国民公报》1919年5月27日。

② 《国民公报》1921年6月29日。

③ 《重庆商务日报十周年纪念特刊》1924年。

年重阳节成立的重庆总商会作为第一个具有社团性质的重庆商业资产阶级组织,不仅完成了行帮会馆向着同业公会的过渡,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第一个具有一定近代色彩的社会团体的出现,标示着重庆社会组织结构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化。

重庆总商会一方面积极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以保护商权,争取民权,另一方面也以不同形式来表达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从而影响着社会其他阶层。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重庆商界和学界成立了“重庆商学联合会”,以“提倡国货,维持现状,联络商学界一致行动”为宗旨,^①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重庆总工会”也于1920年成立投入这一运动。

重庆社会组织结构中的社团化意向是坚持反帝爱国,形成了全社会性的持续不断的运动态势,促进了重庆人爱国民主意识的普遍觉醒。仅只1926年9月5日“万县惨案”发生后,9月10日重庆市民大会通电宣布“由川民自动废除英国对华之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川境完全失效。”^②9月18日,全市罢市、罢课、罢工,300多个社会团体共6万余人举行反英大游行,围观助威群众几达20万人,“规模之宏大,万众之一心,”真是“迥异乎从前”。^③

重庆文化在意识层面的落后,由于“五四”爱国运动的促进,开始慢慢地向全国看齐。但是,重庆商界与学界联合引导的意识觉醒,因受制于不同阶层的利益需要,义与利的难以区分而导致了不同层面上文化运动的混淆,使重庆人的意识自觉水平,依然处于落后状态。这除了内陆城市的空间限制之外,主要在于重庆这一商业城市中人口构成的文化素质较为低下,到抗战爆发前,全市47万人口中,加

① 周勇:《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第206—207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国民公报》1926年9月11日。

③ 当时重庆市内人口大约30余万,可谓倾城出动。参加游行的社团数目是以具体参加的各级社团数量来统计的。《重庆工人运动史1919—1949》第75页,西南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